

云龙改编誓师日 琼崖抗日谱新篇

■ 符荣鼎

1938年8月间，国民党驻琼的62军调离琼崖，国民党广东当局决定成立“琼崖守备司令部”作为琼崖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在当局委任保安副司令兼第11团团长王毅升任守备司令兼第九区行政专员时，我方有一批地下党员已打进府城和海口国民党各军政机关，除对赞成团结抗战的文昌派施加影响外，也对实力派的王毅加以争取，使长达一年的国共谈判能尽早达成协议。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后，其军舰、飞机常出现在琼崖海域与上空，防空警报一夕数惊，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琼崖形势越加危急，团结抗战的呼声就越加高涨。

王毅是琼崖人，他深知日军侵琼势在难免，联合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部队助他一臂之力，以支撑危局，也有好处。为求谈判能在日军登陆前达成协议，双方都作了让步。王毅同意我方意见，将琼崖红军改编为地方性部队留在琼崖，改称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直属于“琼崖守备司令部”，历经1年零4个月的琼崖国共谈判遂达成协议。

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共约300人集中到离海口市20公里的琼山县云龙镇，进行改编誓师大会。这里是东路公路干线必经之地，是日正逢集市日，前来观礼的群众和游击战士的亲友，以及革命老区的群众带来了各种礼品，摆满在部队前面的广场上。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落，充分显示出人民

群众对子弟兵的拥护和密切关系。

王毅在队前发布对冯白驹的委任令，并号召团结一致，加紧训练，做好准备，迎击入侵之敌。冯白驹同志代表独立队全体官兵讲话，表达了誓死保卫琼崖的决心，并带领部队高呼“坚决抗日、保卫琼崖”等口号。琼崖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会，宣告了琼崖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宣告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改编后，部队在琼崖特委和冯白驹的领导下，争分夺秒地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两个月训练结束后，日军登陆琼崖，独立队训练转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1939年2月10日清晨，我们驻在云龙附近儒米村的第一中队正在操场操练，突然，隐隐的大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不断从海口方向传来，大家立即停止了操练。只见独立队队长冯白驹带着几个传令员从队部疾步走来。不等大家发问，他就亮开嗓门大声说：“同志们！日军从海口方向登陆了！你们1中队立即吃饭，饭后赶到潭口渡口去，协同友军坚决阻击从潭口渡江东进的敌人，掩护人民群众安全撤退！”

我们仓促吃完早饭就紧急出发了。一路上，大家很少说话，只想尽快赶到潭口去，打好琼崖抗战第一仗。一

直走到潭口，仍然没有发现国民党军队前来阻击日军。后来得知，日军一登陆，潭口一带的群众就逃进山林去躲避，而驻府城、海口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听说日军登陆，便放弃阵地夺路而逃，连王毅也带着军政人员及其眷属仓

皇逃往嘉积，尔后又到定安县的岭口、翰林山区躲避去了。

我们到潭口渡口东岸后，便成一横列埋伏在沿江公路内侧的丛林里。当时，河岸附近的树木已被炸得东倒西歪，几间房子有的已被炸塌，没有被炸倒的也是椽折瓦落，墙裂梁歪。在我们进入阵地后不久，敌机便更加频繁地对渡口轮番轰炸扫射。一时间，渡口被炸得沙石横飞。埋伏在渡口近处的1班长李文奇被炸弹炸断了左脚，血流不止。当时，我们连急救包、止痛片都没有，只能用撕下的衣服布条给他包扎伤口，将他背到路旁的海棠树下。李文奇忍着巨大的疼痛，一声不吭，只是怒目瞪着敌机，最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

李文奇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同志们怒不可遏，有的对着敌机大骂，有的则眼睛喷射着仇恨的怒火。当敌机俯冲时，守渡口的部队用排枪对空扫射；等敌机掠过再回头轰炸时，又立即向后面的丛林里转移。我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饿着肚子在潭口渡口坚持了整整一天。傍晚，敌机终于飞走了，对岸的敌人也不见动静，3中队文书黎岩来传达了冯白驹队长的收兵命令，我们才从阵地撤了出来。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许多从丛林里走出来的群众，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队，又看到我们抬着李文奇同志的遗体，纷纷议论起来：“看共产党的独立队，人少枪劣还顶上去打日本，可国民党却逃得比黄鼠还快。”群众回去后，一个个都成了最好的

宣传员，独立队勇敢阻击日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各地。

当晚，独立队留下一个中队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实行空室清野，并准备在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大队部和另外两个中队撤退到琼山县的树德和文昌县的大昌一带山区，发动群众，掀起军民团结抗战热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独立队迅猛发展成1400多人的人民军队，在敌后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琼崖特委和独立队与国民党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后，立即建议成立两党的协商机关“琼崖战时党政处”，并向党政处提出在基层行政单位成立保卫琼崖动员委员会。双方部队曾经两次联合对日军作战。第一次是在1939年3月间，由国民党军保安11团1营、壮丁常备队两个大队和我军1个中队及我党领导的南阳乡游击队1个中队，联手向文昌县城守敌发动进攻。第二次是6月间，我1大队和国民党军壮丁常备队1个大队，联合进攻琼山县文岭日军据点。两次作战，均由国民党军统一指挥。原想在日军立足未稳之际攻克敌据点，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两次作战都以失利告终。

我们接受这两次失利的教训，在单方面对日军作战时改用游击战术，抓住日军疏漏，掌握其行动规律，采用短距离伏击、化装偷袭等麻雀战术，取得了不少战斗胜利。

1939年3月，我们首先在琼山县罗牛桥伏击日军军车两辆；5月，我们在海口市郊长村桥化装修路工人，突然袭击

监督修路的日军；6月，又派兵化装袭击文昌县城北门日军哨所；这些战斗均取得预期的战果。特别是在8月，我们发动群众破坏敌据点水源的同时，集中1个大队又1个中队的兵力在琼山县罗板铺伏击日军给据点送水的武装运水车，全歼日军官兵11名，焚烧敌军车1辆，获轻机关枪1挺，步枪5支，我仅轻伤2人，开创了我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军的战例。接着，“星洲洋务工人抗敌后援会”相继成立。香港“琼崖旅港同乡会”和“琼崖旅港商协会”（以下简称“两会”）也积极支持成立琼崖抗日救护队等抗日群体团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筹款，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南洋所属菲律宾、越南、暹罗（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礼堂举行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同年11月，来自南洋各地的琼籍侨团代表80余人，在香港成立“琼崖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总会”），统一下属南洋华侨救国乡工工作，会址设在香港。会议决定：原属“两会”的“琼崖抗日救护队”改名为“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由范世儒先生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隶属于“总会”领导。服务团成立后，一面学习抗战的政治理论，一面学习战地救护技术，随时准备着返琼共赴国难，直接为抗日军民服务。

1939年2月10日，日军铁蹄踏进琼崖，海口沦陷，广大琼侨无不义愤填膺，“总会”当即决定，组织起来的香港服务团，由我率领立即启程回国和全琼同胞共负救国救乡之责。同时，还决定新加坡、越南、暹罗也相继组织服务团派遣回国。

服务团一批又一批从南洋回乡参加抗战的实际行动，形成了巨大的无声宣传，坚定了琼崖人民的抗日信心。“港团”、“新团”和“越团”共240多人，都是“总会”发动、组织和直接领导的。为了加强领导，便于开展工作，“总会”决定“三团”联合成立“总团”。1940年6月“三团”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由符克同志传达“总会”关于“三团”合并成立“总团”的决定。由符克同志担任总团长，下设总务、秘书、宣传、组训、医务等股，有组织计划地开展工作。

服务团自踏上故土之日起，虽屡遭逆流的冲击，仍不畏艰险，积极地展开抗日宣传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以口头宣传为主，包括街头演讲、个别谈话和组织小型座谈等，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歌剧队，进行文艺宣传，先后到文昌、琼山县10多个乡演出，每场观众少则几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在文字宣传方面，主要是出墙报、写标语、散发传单和油印《团刊》和小册子，及时报道、传播岛内新闻、战地简讯、沦陷区日军暴行录和各地群众抗日斗争的情况。

在救护医疗服务工作上，我们所带的医药用品，一部分送给了国民党琼崖当局和抗日有功的冯白驹部，剩下一部分则分发服务团各队使用，在进行抗日宣传的时候，也给抗日军民免费送医送药。当时，日军到处“扫荡”，杀人放火，伤病群众比比皆是，我们就组织力量，主动上门为群众解难。久而久之，我们的医疗工作，在国民党一些官兵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党文昌县长詹学新请我们在文昌办一个医务所，为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并为部队培养了90多名军医和一批护理人员，受到部队的好评。

符克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之后，服务团的同志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发展进步力量，克服统战逆流。由于文昌县长何定之与日伪划地分防，摧残抗日人民，激起公愤。因此，全县的6个区（全部）、34个乡选出代表，在宝芳乡排沟村召开盛大的代表大会，选举詹学新同志为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建立了琼崖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至12月，德国、日本先后发动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同时，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国。12月25日香港沦陷。服务团海外联系中断，侨援断绝，这给我们带来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向中共琼崖特委写了专题请示报告，特委考虑到服务团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必须保留服务团的名称，至于全体团员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首先征求本人意见，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决定去向。当时，同志们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极为不满，绝大多数报名参加独立总队。有些同志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日军的暴行，我确实忍不住，早想参军杀个痛快，今天的机会，不能错过，坚决参军去。”还有约30%的同志报名回乡参加民主政权或群众团体的工作。经过领导批准后，同志们高高兴兴地奔去新的工作岗位，同全琼同胞一起坚持抗日战争，直至日军投降。

1942年冬，由服务团提出倡议，经文昌、琼山、琼东等县民主政府和乐（会）万（宁）办事处和澄（迈）临（高）办事处派出代表多次协商，决定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会采纳中共琼崖特委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国民党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在民主政府组成人员中各占三分之一）。筹备会成立后，当年11月10日在琼文交界的树德乡下昌村召开了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建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方案。一致选举冯白驹为主席，刘秋菊、潘云波、史丹等12人为委员。从此琼崖人民在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发展进步势力，万众一心，有力地开展对敌的斗争，争取琼崖抗战的最后胜利。

（原载于《琼崖星火》丛书）

作者简介

符思之（1912~2000），海南省文昌市坡镇人。1950年6月至1966年5月，任海口市第一届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海南区委工业部部长、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副主任；1966年5月至1984年，历任广东省重工业厅副厅长，广东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

精忠报国赤子心 南洋华侨爱乡情

■ 符思之

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撼海外。在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海外各界侨胞和港澳同胞一致奋起救亡。1938年8月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接着，“星洲洋务工人抗敌后援会”相继成立。香港“琼崖旅港同乡会”和“琼崖旅港商协会”（以下简称“两会”）也积极支持成立琼崖抗日救护队等抗日群体团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筹款，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南洋所属菲律宾、越南、暹罗（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礼堂举行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同年11月，来自南洋各地的琼籍侨团代表80余人，在香港成立“琼崖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总会”），统一下属南洋华侨救国乡工工作，会址设在香港。会议决定：原属“两会”的“琼崖抗日救护队”改名为“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由范世儒先生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隶属于“总会”领导。服务团成立后，一面学习抗战的政治理论，一面学习战地救护技术，随时准备着返琼共赴国难，直接为抗日军民服务。

1939年2月10日，日军铁蹄踏进琼崖，海口沦陷，广大琼侨无不义愤填膺，“总会”当即决定，组织起来的香港服务团，由我率领立即启程回国和全琼同胞共负救国救乡之责。同时，还决定新加坡、越南、暹罗也相继组织服务团派遣回国。

服务团一批又一批从南洋回乡参加抗战的实际行动，形成了巨大的无声宣传，坚定了琼崖人民的抗日信心。“港团”、“新团”和“越团”共240多人，都是“总会”发动、组织和直接领导的。为了加强领导，便于开展工作，“总会”决定“三团”联合成立“总团”。1940年6月“三团”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由符克同志传达“总会”关于“三团”合并成立“总团”的决定。由符克同志担任总团长，下设总务、秘书、宣传、组训、医务等股，有组织计划地开展工作。

服务团自踏上故土之日起，虽屡遭逆流的冲击，仍不畏艰险，积极地展开抗日宣传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以口头宣传为主，包括街头演讲、个别谈话和组织小型座谈等，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歌剧队，进行文艺宣传，先后到文昌、琼山县10多个乡演出，每场观众少则几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在文字宣传方面，主要是出墙报、写标语、散发传单和油印《团刊》和小册子，及时报道、传播岛内新闻、战地简讯、沦陷区日军暴行录和各地群众抗日斗争的情况。

在救护医疗服务工作上，我们所带的医药用品，一部分送给了国民党琼崖当局和抗日有功的冯白驹部，剩下一部分则分发服务团各队使用，在进行抗日宣传的时候，也给抗日军民免费送医送药。当时，日军到处“扫荡”，杀人放火，伤病群众比比皆是，我们就组织力量，主动上门为群众解难。久而久之，我们的医疗工作，在国民党一些官兵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党文昌县长詹学新请我们在文昌办一个医务所，为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并为部队培养了90多名军医和一批护理人员，受到部队的好评。

符克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之后，服务团的同志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发展进步力量，克服统战逆流。由于文昌县长何定之与日伪划地分防，摧残抗日人民，激起公愤。因此，全县的6个区（全部）、34个乡选出代表，在宝芳乡排沟村召开盛大的代表大会，选举詹学新同志为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建立了琼崖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至12月，德国、日本先后发动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同时，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国。12月25日香港沦陷。服务团海外联系中断，侨援断绝，这给我们带来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向中共琼崖特委写了专题请示报告，特委考虑到服务团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必须保留服务团的名称，至于全体团员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首先征求本人意见，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决定去向。当时，同志们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极为不满，绝大多数报名参加独立总队。有些同志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日军的暴行，我确实忍不住，早想参军杀个痛快，今天的机会，不能错过，坚决参军去。”还有约30%的同志报名回乡参加民主政权或群众团体的工作。经过领导批准后，同志们高高兴兴地奔去新的工作岗位，同全琼同胞一起坚持抗日战争，直至日军投降。

1942年冬，由服务团提出倡议，经文昌、琼山、琼东等县民主政府和乐（会）万（宁）办事处和澄（迈）临（高）办事处派出代表多次协商，决定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会采纳中共琼崖特委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国民党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在民主政府组成人员中各占三分之一）。筹备会成立后，当年11月10日在琼文交界的树德乡下昌村召开了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建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方案。一致选举冯白驹为主席，刘秋菊、潘云波、史丹等12人为委员。从此琼崖人民在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发展进步势力，万众一心，有力地开展对敌的斗争，争取琼崖抗战的最后胜利。

（原载于《琼崖星火》丛书）

作者简介

符思之（1912~2000），海南省文昌市坡镇人。1950年6月至1966年5月，任海口市第一届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海南区委工业部部长、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副主任；1966年5月至1984年，历任广东省重工业厅副厅长，广东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

智拔日军毒据点 美德之战显神威

■ 王山平

1942年的深秋时节，刚刚完成一次长途奔袭任务的2支队1大队，在副支队长覃威、大队政委吴文龙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驻地文昌县南阳乡。干部们连脸也顾不得洗，就聚集在一间屋子里，商议起新的作战任务。

为了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国耻日，早在9月初，支队参谋长就传达了支队部的决定：在琼（山）文（昌）公路干线上组织一次伏击敌人军车的行动，力争缴到机关枪。凑巧地方同志送来情报：近日来，驻文昌县城的日军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辆军车出动，每辆车载有一二十人，配有轻机枪，上午向潭牛、海口方向出发，下午再返回。覃威同志立即派驳壳枪排排长李贤祥到公路去侦察，10天后李贤祥侦察回来，覃威、吴文龙同志立即召集支队干部开会，决心打好这一仗！

吴克之支队长一声令下：“冲啊！”各路战士一跃而起，呐喊着向敌人冲杀过去。刹那间，喊杀声、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敌人四处乱窜。黄大明同志飞身一脚把敌掷弹筒踢翻在地，夺了掷弹筒。洼地里的敌人很快就被消灭了。后车上的5个敌人带着重机枪，企图乘车逃回美德，却在三铺二叉路口遭到2支队3大队7中队的警戒部队截击，结果车毁人亡，重机枪落在我们手中。

在潭牛方向，2支队与敌人激战将近1个小时，日军虽在武器上占优势，但我们在兵力上占上风，双方隔着开阔地带，战斗处于相持状态。我们美德方向打响后，潭牛敌人曾向2支队发起两次进攻。企图硬冲过去救援美德之敌，但都被我们打退了。当前来增援的1支队1大队赶到后，1、2支队密切配合，向敌人发起攻击。日军见援救无望，便狼狈地缩回潭牛据点。大致坡据点的日军是徒步赶往美德方向去增援的，走了一半路程竟下起雨来，满地泥泞，日军士兵大皮靴泥沾靴重，雨大路滑，弄得满身泥水，无心恋战，便赶紧调头回去了。

美德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是一次两个支队的联合伏击，规模较大，缴获较多，击毁敌军车2辆，歼敌6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25支，还有其他一些战利品。这次战斗使我家的军威大振，更激起琼文地区群众的抗日斗志，大批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我第1、第2支队的各个大队，很快就由2个中队扩编为3个中队。

日军受到这次战斗的沉重打击后，其琼文地区的各个据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敢轻易出动。美德守敌怕我军再次袭击，于翌日夜便灰溜溜地撤走了，这颗插在琼文抗日根据地上的毒钉子，终于被拆掉了。

（原载于《琼崖星火》丛书）

作者简介

王山平（1919~1991），海南省文昌市三江镇道学上村人。1939年参加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中队长，琼崖纵队第三总队参谋长，海南军区司令部正师级顾问。荣获国家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奖章各一枚。

大队为主体的统一领导机构。进而制定军民联合围攻那大的作战计划。

10月下旬，在南丰乡的松木村，我主持召开围攻那